高翰，王兴平. 嵌入与飞地：亚的斯亚贝巴中国移民的小型商业实践. 世界地理研究，2026，35（8）：79-91.［GAO Han，WANG Xingping. Embeddedness and enclave：Small business practices of Chinese migrants in Addis Ababa. 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6，35（8）：79-91.］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6.08.20250443

嵌入与飞地：亚的斯亚贝巴中国移民的小型商业实践

高 翰，王兴平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南京 210096）

摘 要：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大量中国移民迁移至非洲从事小型商业活动，这一现象引发了关于移民如何在东道国融入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学术讨论。研究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中国移民的小型商业活动为代表性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过去20年间中国移民商业网络和空间分布的发展脉络。研究揭示，中国移民通过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建立经济和社会网络，采取“双重嵌入性”策略以实现其生存和发展。面对当地社会的排斥及自身的不安全感，中国移民塑造出“飞地”这一自我隔离的经济和社会空间。飞地的形成不仅是面对排斥的被动反应，更是中国移民为保护自身利益、维护社会网络而采取的主动策略。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移民小型商业活动的特征，并为促进中国移民的海外经营和生活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亚的斯亚贝巴；中国移民；小型商业；双重嵌入性；飞地

0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超过100万中国企业家、工人、工程师、经理等移民陆续来到非洲[1]，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和国际援助等多种跨国实践，形成了国际移民的新格局[2]。这些移民不仅包括跨国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参与者[3]，还包括众多自发来到非洲的个体经营者[4]，他们通过多元的商业实践，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在此背景下，小型商业活动成为中国移民“走出去”经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5]。这些由中国移民经营的小型商业，通常规模较小、人员精简、资源有限[6]，区别于规模庞大、资金与技术充足、管理层级复杂的大型跨国企业，其经营范围一般局限于特定的城市市场，业务类型包括餐馆、超市、发廊等小型零售业和服务业。这些小型商业通常由个人或家庭经营，具有较强的经营灵活性与适应性。

近年来，当代中国跨国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嵌入性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相关研究日益增多。有学者考察了中国人在非洲的日常生活、身份认同、经济活动以及这些方面在东道国社会环境中的嵌入状况[7,8]。研究表明，中国移民能够在母国和东道国

收稿日期：2025-06-08； **修订日期**：2025-09-04
作者简介：高翰（2000—），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中非合作，E-mail：gaohanseu@outlook. com。
通信作者：王兴平（1970—），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规划、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一带一路”产业园区规划，E-mail：wxpsx@seu. edu. cn。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之间建立定期的流动机制，整合并利用国内的特定资产与具有区位优势的当地资源[9-11]。但是这些活动始终面临嵌入与脱嵌的持续张力：虽然去地域化的资本和劳动力是全球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为中国移民的跨国流动和扎根地方消除限制[12]，但资本等全球化力量并不能完全消解东道国的地方性社会结构，因此中国移民在一定程度上会与原住民社会产生隔阂[13]，甚至与本地经济构成竞争关系[1]，形成“自我隔离”的飞地现象。但是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大型跨国经济活动，如大型跨国公司和大规模劳务输出等大型经济活动[14]，相比之下，学界对资源有限的中国移民小型商业的在地嵌入机制，了解仍然不够充分。这就引出了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在缺乏强大资本与制度性支持的情境下，中国移民的小型商业如何依托跨国网络与地方性资源，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嵌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如何通过商业协作与规则适应来建构飞地空间？这些实践揭示了怎样的嵌入路径与策略选择，又凸显了哪些独特的困境与张力？

本研究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的中国移民小型商业活动为案例，旨在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移民在非洲的相关研究，并构建“双重嵌入-飞地化”分析框架；随后介绍研究设计与资料来源；最后，在上述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以亚的斯亚贝巴的中国移民小型商业活动为案例，分析其经济与社会嵌入的路径及面临的困境，并在结论部分进一步讨论这一现象对理解中国移民在非洲社会融入的启示。

1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1.1 文献综述

当代跨国移民研究已从线性同化转向“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与“流动性转向”（Mobility Turn）等新范式。跨国主义强调移民通过持续的跨境社会、经济与文化实践，维系着一个跨越国界的社会场域[15]；而流动性转向则进一步将焦点从静态群体转向动态过程，揭示人、资本与信息的流动如何重塑社会空间[16]。

在这一背景下，“嵌入性”（Embeddedness）成为理解移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概念[17]。此概念源于波兰尼（Polanyi）的理论，强调经济行动深植于社会关系与制度结构之中[18]。在此基础上，双重嵌入性（Dual Embeddedness）理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来解释移民经济活动[19,20]，认为移民创业者必须同时嵌入两个既相互关联又充满张力的环境中：一是东道国的主流市场与制度（外部嵌入），二是基于母国族裔的跨国社会网络（内部嵌入）[21]。这一理论清晰地解释了移民经济兼具高度本地化与深受跨国网络影响的多尺度特征[22]。例如，周雯婷等在苏州淮海街的研究表明，侨乡网络通过跨境联系推动了族裔经济空间的在地化[23]；Lampert等人对加纳等国的中国移民小商业的研究，揭示了“族裔经济”的特点[24]，即中国企业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优势，将产品和服务瞄准中国客户和其他中国企业；这些研究表明，中国跨国移民通过嵌入华人“关系”网络和东道国的商业环境，能够建立稳定经济回报的良性循环，并且能够促进信息交换和其他非正规合作，从而加速融入当地社会。

然而，双重嵌入的理想平衡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当双重嵌入呈现不均衡状态时，“飞地”（Enclave）便成为其最显著的社会与空间后果[25,26]。传统观念常将飞地视为社会排斥之下形成的孤立区域，然而在批判地理学的推动下，对飞地的理解已大为不同。它既被视为移民面对外部压力通过强化族裔社会关系来抵抗本地威胁的防御性空间[27]，也被看作是其主动建构的策略性缓冲带，能够使移民在地方情境下维护自身权益并构建自我认同[28,29]。例如，宋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宗员等指出,在穗非洲移民通过互动与空间实践建构地方感,却同时遭遇制度壁垒的排斥[30];金鑫等对比移民飞地的“传统模式”与“广州模式”,指出当代中国移民社区具有高度流动性和临时性[31];江荣灏等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广州的非洲移民社区并非单纯的隔离空间,而是通过社会关系和空间再生产来维持生计与认同[32]。同时,非洲本土学者的批判性研究丰富了该视角,他们指出中国移民社区与当地社会在劳工、市场等方面存在矛盾,而正是这些外部的紧张关系凸显了飞地作为防御与策略空间的必要性[33,34]。

综上,现有文献虽已积累颇丰,但在理论层面仍存不足:双重嵌入的动态过程与飞地的空间形态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尚未得到体系化的梳理与连接。多数研究或侧重于嵌入的过程,或关注飞地的形态,却未能有效解释前者如何在特定条件下促成后者的形成。本文旨在弥合这一理论缺口,通过结合双重嵌入性与飞地理论,构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以系统性地揭示经济与社会网络在移民空间策略中的内在机制。

1.2　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本文提出以“双重嵌入-飞地化”作为核心分析框架(图1)。该框架旨在揭示,移民的空间实践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其嵌入策略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对于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移民小型商业而言,这一框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与能够依托雄厚资本和制度支持开展市场渗透的大型跨国企业不同,小型商业高度依赖灵活的、非正式的网络来谋求生存,其嵌入路径呈现出显著的特殊性。因此,飞地不应被简单视为嵌入失败的消极后果,而应被理解为移民在双重嵌入过程中,为应对外部制度与市场环境的强约束,所采取的一种主动的、空间化的适应性策略。这一策略的本质是内部嵌入网络的系统性强化与外部嵌入的选择性工具化。

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移民需要在母国关系网和东道国社会环境之间不断调整以寻求平衡。在理想状况下,移民可通过同时嵌入母国社会网络与东道国制度环境,获得最大竞争优势;然而,在许多制度环境尚不稳定、市场壁垒较高的全球南方国家,这种理想的平衡状态极难维持。移民的外部嵌入往往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风险,对于缺乏足够资本和法律资源来应对这些风险的小型商业而言,全面深入地嵌入东道国主流市场既不现实也非最优选择。因此,移民群体通常会发展出一种非对称的、动态的双重嵌入策略。在此策略中,他们会有侧重地强化内部关系网,并以此为基础,选择性地与外部环境开展互动。具体来说,移民首先通过构建一个基于母国社会经济网络的内部嵌入系统——如,与母国族裔形成紧密联系的供应链、非正式资金融通渠道和稳定的客户网络——来确保基本的社会关系生产与资本积累[35]。这对于启动资金有限、难以获取当地银行信贷的小型商业来说至关重要。这个基于亲缘、地缘关系网络的内部系统高度依赖母国的社会和经济网络,并且通过自我强化的信任再生产和信息共享[36],为移民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中构筑了一个稳固的生存场域[37]。然而,这个内部网络并非主动与社会隔绝,恰恰是为了更有利、更可控地与东道国社会进行选择性互动。移民以内部网络的集体资源和信息优势为依托,来获得东道国环境中的特定资源。他们会策略性地嵌入东道国制度与市场,例如在劳动力雇用上利用当地的人口红利,在土地租赁上与地方权力精英建立联系,或在商品流通上打通特定的物流渠道。这种外部嵌入具备高度实用主义特征,能够有效地汲取外部资源以反哺内部循环。

这种复杂的双重嵌入策略最终要求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组织形态,由此便催生了“飞地化”的现象。它首先通过地理上的集聚,为内部经济活动和社会网络的再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产提供空间，从而在空间上强化了社群的凝聚力与认同感。更重要的是，飞地构成了移民群体与东道国社会进行选择性嵌入的重要“界面”与“屏障”。它既是一个向内整合资源、强化团结的平台，也是一个向外与东道国社会进行功能性对接（如集体谈判、信息发布、社会交往）的窗口，能够有效降低信息成本，共享客户资源，形成集体议价能力。因此，飞地并非对外部嵌入的消极对抗，而是这一双重嵌入策略在空间上的主动建构。

综上，本框架将“嵌入”视为动态过程，将“飞地”视为空间策略，进而揭示二者的内在联动关系，特别阐释了小型移民商业在结构性约束下形成的独特适应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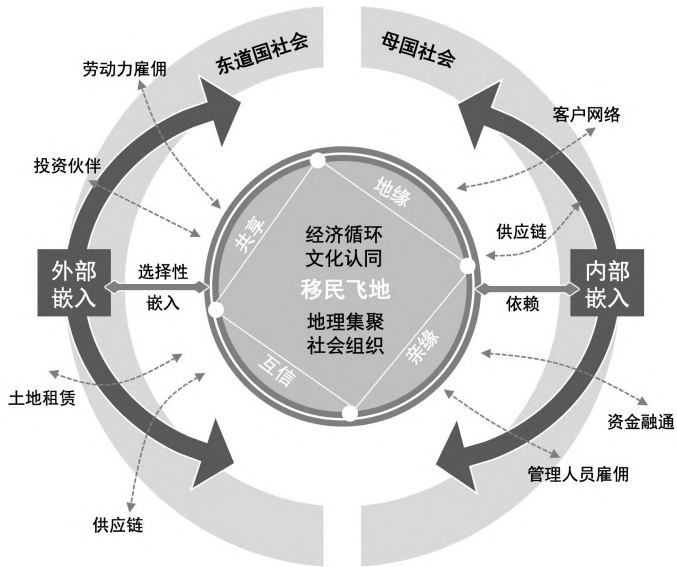


图1 “双重嵌入-飞地化”机制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ual embeddedness - enclavisation” mechanism

2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本研究的案例区域是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作为非洲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与中国长期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活动中引入中国资本，催生了大规模的中国移民迁入现象[38]。

21世纪初，中国的建筑企业开始进入埃塞俄比亚，最初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建筑产业链，包括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简称亚吉铁路）、亚的斯亚贝巴轻轨等标志性基础设施，东方工业园、华坚工业城等工业园区，并承建了亚的斯亚贝巴的多座现代化公共建筑和商务设施。与此同时，中国交建集团、中土集团、中国江苏国际投资集团、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均在亚的斯亚贝巴设立分支机构，带动了中资企业员工、承包商以及依托这些企业网络发展的中国小型商户的持续涌入。

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众多移民聚集地中，卢旺达菜市场（Rwanda Food Market）是中国移民小型商业最为集中的区域。该地区最初因卢旺达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周边形成的蔬菜水果交易市场而得名，随着中国超市和餐馆的聚集，逐渐演变为中国移民小型商业的核心集聚区。即使在大使馆搬迁后，“卢旺达菜市场”的称谓仍被广泛使用。截至2024年12月，该地区约有中国移民经营的小型商业40家，包括6家超市、3家发廊、3家宾馆、4家生鲜门店、20家餐馆以及1家汽修厂。与之相比，亚的斯亚贝巴其他区域的中国移民小型商业则极为零散，未形成规模性集聚。因此，卢旺达菜市场为研究中国移民小型商业的空间分布、社会嵌入与飞地化特征提供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研究团队于2024年7月至12月在卢旺达菜市场开展多次实地访谈和调研。首先,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团队记录了卢旺达菜市场内中国移民小型商业的业态类型、经营模式及其与当地社会的互动情况。其次,研究团队对该区域的所有中国移民商业进行了业态普查,从而根据业态类型抽样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确保每类商业至少覆盖一个样本。

在样本构成上,研究团队共收集了18份有效访谈记录,受访者涵盖各类商业业态的店主或经营者。研究团队还对多位具有代表性的商铺经理进行深度访谈与回访。为便于引用,本文根据商业业态对访谈对象进行编号,首字母代表业态类型,数字代表访谈顺序。例如,餐馆(Restaurant)的访谈对象依次编号为R1、R2等,零售超市(Mart)为M1、M2等,发廊(Barbershop)为B1、B2等,生鲜门店(Fresh Food Store)为F1、F2等,宾馆(Hotel)为H1、H2等。考虑到单一群体视角对现象描述的局限性,本研究还补充访谈了8名与卢旺达菜市场相关的本地人员,包括周边居民(4人)、本地劳动力(2人)以及与中国商户有业务往来的本地供货商(2人)。这些访谈为理解移民商业的本地认知与互动关系提供了有效对照。

在分析路径上,本文并未采用严格的语义编码程序,而是通过案例比较与归纳总结展开研究。具体而言:首先,基于参与式观察与访谈资料,对卢旺达菜市场的中国小型商业进行整体性描绘;其次,从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两个维度,比较不同类型商业的经营模式、互动方式与空间布局特征;最后,整合移民经营者与本地居民的叙述,总结出中国移民小型商业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主要嵌入路径及其飞地化特征。

3　中国移民小商业活动的双重嵌入性

3.1　小商业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

中国移民小商业并非自然而然地出现,而是在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合作的不断深化与移民人口持续流动的过程中逐步演变而来。整体上,它们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1世纪初至2015年的初步集聚、2015年至2019年的快速扩张,以及2020年至今的衰退与局部增长并存。

1)21世纪初至2015年:21世纪初,中国建筑企业陆续进入埃塞俄比亚,最初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建筑产业链领域,但随着建筑工程项目持续增多,一批具有敏锐经济嗅觉的私人投资者在2010年前后进入埃塞俄比亚,开始经营小型商业。这些投资往往缺乏深思熟虑,更多是个人能动性与偶然机遇结合的结果。在这一阶段,卢旺达菜市场的地理位置具有显著优势,毗邻亚的斯亚贝巴的主要公路,连接博莱国际机场和距离主城区23公里的东方工业园(图2),因此成为最初的商业聚集地。先行的中国商人通过开设杂货超市和餐馆等小型商业,创造了初步的商业环境,并将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联系起来。该阶段只有1家杂货超市和3家餐馆投入运营,分布在唐人街的中心位置。

2)2015年至2019年:随着中埃工程合作的持续深化,尤其是亚吉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启动,大量中国工人通过劳务派遣来到埃塞俄比亚。由于当地劳动力多从事农业生产,不具备建筑技能,中国劳工的涌入进一步推动了移民人口的集中。据多方访谈信息推测,在2015至2016年间,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中国移民数量接近20万,其中约5万人聚居在卢旺达菜市场周边。这一人口红利显著刺激了商业活动的扩张。到2019年前后,卢旺达菜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市场已拥有十余家餐馆、若干家超市和生鲜食品供应门店，唐人街沿线逐渐发展为移民社区的经济与社交中心，并与西侧城市主干道紧密相连，呈现出移民社区商业繁荣的景象。

3）2020年至今：进入2020年以后，疫情暴发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推动更多中国商人“出海”寻求机会。“2020年后，国内做生意越来越难，我就决定到非洲闯一闯”，一位受访者（R4店主）这样解释。类似的叙述在访谈中多次出现，其中一部分来自肯尼亚和津巴布韦的移民也选择在亚的斯亚贝巴定居（R1店主）。多位受访者均提到，卢旺达菜市场区域超半数的中国商铺在这一阶段新开业，仅2024年就新增了5家餐馆和1家发廊，商业类型更加多样化。然而，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2019年起，埃塞俄比亚政府调整投资和移民政策，扶持本地劳动力替代外籍务工人员；埃塞俄比亚国内军事冲突和美国取消埃塞俄比亚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免税许可资格，进一步加剧了移民人口外流。卢旺达菜市场的中国居民人数因此减少，租房空置率上升。尽管如此，该商业区依旧保持着较高的活力。许多店主虽然不再居住于市场内部，但依然选择在此经营，保持了商业网络的延续。同时，新兴商铺的不断涌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外流的影响，维持了空间结构的稳定（图3）。



图2 卢旺达菜市场区位示意图

Fig. 2 Location of the Rwanda food market



图3 卢旺达菜市场区域中国移民的小商业活动业态分布示意图

Fig.3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Chinese migrants’ small-scale business activities in the area of Rwandan food market

3.2 本地环境中的“外部嵌入”

在亚的斯亚贝巴，中国移民的数量增加，尤其是中国企业在建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投资扩展,有效催生了当地商业活动的增长,尤其是零售业和食品加工行业。这不仅满足了中国移民的日常需求,也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多样化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在卢旺达菜市场周边,中国移民的消费需求吸引了大量本地资本进入餐饮与零售业,逐渐形成跨族群的合作关系。餐饮业原材料的供给通过紧密衔接本地市场,并嵌入现有的供应链体系,有效带动了周边经济的繁荣。

R3的店主回忆道,“在我们2015年刚来到这里时,(门口)还是泥地、贫民窟和各种动物养殖场,只有几家中国店铺;但这几年过去后,这里(道路等基础设施)都重新修缮,并且本地的咖啡店和其他餐饮行业都增加了”。与此同时,中国移民在开展商业活动时,通常需要租赁土地来开设店铺、餐馆或其他经营空间。这些土地大多通过当地人转让或出租获得,使土地交易成为商业扩展的必要前提。由此,移民经营活动在满足内部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土地流转与本地经济的活跃发展。

此外,埃塞俄比亚的创业环境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低,尤其是在小规模、低技能、劳动密集型的小商业领域。很多中国小企业选择通过雇用当地员工来开展商业活动。通常商店只有经理(店主)和骨干员工是中国人,一般在2~4人不等,其他则是当地人。据统计,餐馆等小型企业雇用的当地员工数量通常超过8人,规模较大的R7餐馆甚至雇用了18名当地员工。超市雇用的员工平均为5人,负责运货、理货等。这些中国企业的本地员工薪酬普遍高于当地其他服务业的平均水平,无特殊技能的员工的月薪为8 000比尔[①]不包括食宿,或5 000比尔包括食宿,是当地同类职位薪酬的1.5倍;而有技术优势(如汽修、翻译、管理等)的当地员工月薪可超过2万比尔。这一薪资水平有效地促进了社区劳动力就业。

埃塞俄比亚的法律严格禁止外国人直接参与批发与零售活动,因此,中国商人必须依赖本地合作伙伴开展商业运营。这些合作伙伴通常负责办理营业执照、管理财务,并与税务部门等行政机关沟通。尽管所有店铺的初期资金主要由中国投资者提供,但埃塞俄比亚合作方在法律和制度赋权下占据了主导地位。为确保商业活动的稳定性,中国商人往往通过建立紧密的社会关系来维系这种依赖关系。例如,M1超市的法人代表是中国投资者的配偶;而R7餐馆的法人代表则由一位与投资者长期保持私人交往和合作关系的本地朋友担任;M3超市、R5餐馆和R6餐馆的法人均由其房东担任。这些实践表明,移民群体在制度约束下发展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契约模式。该模式一方面通过强化信任机制提高了跨文化合作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移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政策与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

最后,除了经济合作,许多中国移民还通过参与当地的社会慈善活动,响应社区的需求,并借此加强与当地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关系。这些社会活动不仅提升了商人在社区中的形象,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M3的经理介绍道:“每次埃塞俄比亚有国内庆典节日,我们每一家店铺也捐几千至上万比尔不等”。

3.3　中国移民经济网络中的“内部嵌入”

早期中国移民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卢旺达菜市场区域,逐步发展出一个嵌入华人群体内部经济与社交网络的体系。依托面向同胞的跨国供应链,中国商人能够向埃塞俄比亚的移民群体提供来自中国的商品与原材料,从而形成较为成熟的商品流通网络。

以食品供应链为例,当地华人社区形成了一套稳定的供给体系。两位中国商人在亚的

①比尔(birr)是埃塞俄比亚法定货币,截至2025年9月,人民币对比尔的汇率约为1∶2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斯亚贝巴近郊区经营两个农场，分别位于首都南部50公里和首都北部100公里处，主要从事蔬菜种植与畜牧养殖，并在卢旺达菜市场设有生鲜零售门店，同时为本地的华人餐馆与超市持续供货。这些餐馆和超市与农场建立了长期的订货关系，再将农产品分销给在埃塞俄比亚的中国消费者。由于当地市场可替代的蔬菜种类有限，这些农场产品凭借供给的稀缺性，牢牢占据了供应链的核心环节。此外，面粉、调味品等商品必须从中国进口，当地的六家超市充当了进口商，连接中国本土的商品供应链与当地市场。这种商品网络不仅保障了物质供给，还深化了移民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系（图4）。譬如，上述农场经营者曾与R7餐馆老板合资经营农场，尽管2020年后R7餐馆老板退出了农场经营，但他们仍通过供应链维持合作与互助。这种互惠机制强化了群体内部的信任与凝聚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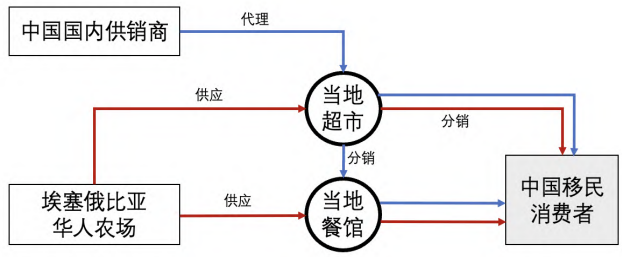


图4 食品供应链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ood supply chain

随着商业网络的不断扩张，卢旺达菜市场也逐渐演变为服务于华人经济网络的消费与社交中心。这里除设有各类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商铺之外，还衍生出多样的文化与社交服务，包括由华人社群自发组织的节日聚会、卡拉OK厅与麻将馆等娱乐场所。这些场所不仅满足了情感与文化需求，也进一步推动了内部循环的形成。换言之，中国移民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日益依赖这一内部体系，而这一体系也实现了物质供给与社交网络的双重自给。

在此基础上，这些小型商业的运行不仅依赖于商品与服务的内部循环，还深深嵌入跨国资金流动和亲缘网络之中。这些中国移民在经营过程中普遍依赖来自中国的资金、技术和人员支持，并且与其他华人企业保持紧密联系。持续的中国投资——尤其是建筑业投资——对维持小型商业活动尤为重要。由于埃塞俄比亚投资法案的限制，小型服务业难以取得埃塞俄比亚长期居留许可，因此部分商家通过借助与大型工厂投资者的关系间接获得经营空间与合法性。例如，R4餐馆的店主解释道："这个餐馆是我父亲托人介绍的店面，我父亲在埃塞俄比亚建筑行业投资超过十年，并给了我20万（人民币）启动资金；在节假日，餐馆内的院子是我和我父亲的其他朋友聚会的地方。"

在经营模式上，超过80%的商家呈现出典型的家庭经济特征，夫妻或亲戚是运营的核心。这些商业活动深深植根于一个由地缘、亲缘、友缘构成的跨国社会网络之中。在共同经营的过程中，移民之间的社会联系持续巩固，因此，商铺在地理上的邻近性，便成为维系这些关系网的关键。例如，受访的M3超市、R5餐馆和R6餐馆共用一栋联排平房及后院，共同雇用了6名本地员工和3名中国管理人员。这3位管理者互为亲属，其中一人（M3超市管理者）将另两人介绍到此地经营餐馆，并按投资比例分配利润。这个案例生动地展示了亲缘关系、空间共享与经济合作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4 飞地建构与移民的自我维持机制

4.1 边缘化的经济定位

在当地经济体系中，大多数中国小商业从业者仅为市场边缘性参与者。这种边缘化并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非完全源于被动的排斥,也包含了主动选择的结果。受限于经营模式和供应链特征,这些小商业活动主要沿用中国的商业逻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来自中国的商品、资金和劳动力支持。绝大多数华人超市的货架上,不仅有中国特有的食品调料,还有中国品牌的日用品,如特定品牌的牙膏、洗衣液,甚至还包括由当地食材制作的中国豆腐、咸菜等。这意味着他们的核心业务,从商品选择、文化品位到最终消费,整体构成了一个与埃塞俄比亚本地消费体系平行的经济飞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华人餐厅的菜单更新,其灵感往往来自中国国内流行的"网红菜品",而非尝试融合本地食材或口味。他们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关注国内餐饮趋势,并依托华人供应链复刻这些菜品,从而与本地市场的饮食文化始终保持着距离。这种隔阂不仅体现在供给端,也影响到本地居民的消费体验。一位受访的当地居民坦言:"这些餐馆的消费不适合我们。菜单全是中文,看不懂也没办法沟通,而且价格还以人民币结算,太贵了。"

此外,这种以华人社会经济网络为主的经济模式,使得中国移民的小型商业在本地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对有限。尽管少数企业家通过婚姻等方式与本地社会建立起稳固的社会关系,但大部分中国移民除开展有限投资合作以及劳动力雇用之外,无法融入当地的资源和市场。根据访谈和实地观察,超过九成的顾客是中国人,而理发店等服务业的顾客几乎完全是中国人,与当地非华人社区基本没有互动。

4.2　流动性与制度性不稳定

在埃塞俄比亚的中国移民群体中,高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是普遍现象。这种流动性不仅体现在个体的迁徙选择上,也体现在他们对商业投资和社会关系缺乏长期承诺。多数中国移民仍然保持着强烈的中国文化认同,与当地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存在一定隔阂。他们往往将埃塞俄比亚视为谋生和积累资本的中转站,而非最终的落脚点。正如一位来自肯尼亚内罗毕的餐馆经营者所言:"我的目标是在非洲每一个国家都开一个兰州拉面店,因此我未来大概会离开埃塞俄比亚前往乌干达等其他营商环境友好的国家"(R1 店主)。这种"候鸟式"心态使他们在社会关系和资本投入上更倾向于短期收益,弱化了长期嵌入的意愿。

不稳定性还表现为劳资关系的脆弱。中国商人普遍依赖本地劳动力从事服务与体力劳动,但本地员工的高流失率使得劳资关系难以维持稳定。许多本地员工在掌握基本技能后,选择前往中东国家寻求更高的薪酬,这导致商家被迫频繁招工和培训新人,增加了经营成本与不确定性。一些受访商户反映,即便在技能要求低的餐饮和零售业中,人员流动也非常频繁。"有的服务员干两三个月就走了,我们得不停地教新人。"(H1 店主)。

此外,移民的不稳定性还受到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和居留政策对小型服务业存在诸多限制,许多移民只能依靠挂靠关系或临时签证经营,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在这种情境下,移民普遍缺乏在地归属感,也难以在社区层面建立稳固的社会关系。这种制度性的不确定与个体性的流动策略相互叠加,使得中国移民群体在经济与社会层面都处于一种"临时性存在"的状态。

4.3　飞地的主动建构

面对边缘化、流动性和不安全感,中国移民逐渐建构出一种主动适配的飞地策略。这不仅是一个物理上的商业聚集区,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通过内部的紧密协作和外部的审慎应对来保护群体利益。在内部,飞地表现为高度密切的商业协作网络。商户之间依靠微信群、同乡会等渠道,频繁交换关于政策变动、海关检查、治安状况和汇率波动等相关信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息，从而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经营风险。正如M4的经理所言："谁要是办居留许可证遇到了新麻烦，马上会在（微信）群里说，大家就知道最近要注意什么，该找谁去办"。这种即时信息共享机制，使得个体商户能够集体性地规避经营风险。与此同时，商户之间的资源整合也十分普遍，例如共同租赁集装箱运输货物、在本地联合采购以提升议价能力，甚至通过小额资金拆借解决彼此的资金周转困难。飞地内部逐渐形成一条微型供应链：华人清关公司服务于贸易商户，贸易商户又为餐馆和超市提供商品和原材料。这种内部循环不仅提高了效率，也确保了商业活动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然而，飞地并非完全封闭，而是充当"缓冲带"，移民们以此为平台，策略性地维系着各类外部联系。例如，面对当地复杂的法律和税务体系，许多中国商人选择聘请当地会计、律师或中间人，将复杂的行政、法律和税务事务外包，以支付服务费的方式解决制度沟通障碍并节省精力。这种做法既确保了他们能够遵守当地法律，又无需直接陷入陌生的官僚体系。此外，他们与少数关键的本地行动者建立了弱纽带关系，如房东、社区官员和税务局的高级雇员，这些关系往往通过互惠原则维持，例如提供小额礼金和长期稳定的租金。这些"弱纽带"虽然不追求情感联系的强度，却足以确保商业环境的稳定。在劳工管理上，中国雇主逐渐形成了一种混合模式：核心岗位由家人或同乡掌握，以确保经营的连续性；非核心岗位则交给本地雇员，并从中培养一个长期就职的当地员工作为管理人员，由其向其他员工传授服务、搬运货物、收银等技能。这一模式虽然并非以培训为目的，却在实践中推动了本地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和适应。

通过内部协作和外部适应的双重过程，中国移民实现了"双重嵌入"。他们首先深度扎根于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华人"飞地"网络，这一网络为他们提供信任、资本、资源和文化认同，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根基。以此为平台，他们选择性地与东道国的法律、市场和劳动力体系进行互动。这种外部接触并非全面的融合，而是规避风险、追求实效和利益导向的实用策略。因此，飞地的核心作用并非切断与本地社会的联系，而是通过维持内部凝聚力来实现一种可控的、策略性的外部连接。正如M1经理所说："我们的顾客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无需过多担忧（埃塞俄比亚）最近的冲突和市场的波动问题"。这个观点揭示了飞地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即它不仅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内部市场和协作网络，也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为移民群体提供了维持生计与保持相对独立的制度性保障。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基于对亚的斯亚贝巴"卢旺达菜市场"中国移民小型商业的实地研究，本文揭示了跨国移民经济实践中"嵌入-飞地"的双重逻辑，并提出"小型商业的双重嵌入与主动飞地"的分析视角。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现有文献通常将"嵌入"视为移民经济成功与社会融入的正向过程，而将"飞地"视为嵌入失败的被动结果。本研究的发现表明，这种二元化的理解过度简化了移民嵌入的过程。在亚的斯亚贝巴，中国移民的小型商业实践揭示了"嵌入"与"飞地"并存、互动的规律：一方面，移民商业在劳动力、供应链和消费市场中与本地社会进行紧密互动；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动通过构建"飞地"来维持族群网络和降低风险。由此可见，"飞地"绝非隔离和排斥的被动结果，而是移民群体在不确定环境中增强生存韧性的主动适应性策略。这一发现拓展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了对飞地的理解,将其置于移民适应性策略的框架之中。

其次,现有研究多强调移民在东道国社会中的单向嵌入,而忽视了跨国网络和族群经济的作用。本研究阐释了“双重嵌入”概念,即移民商业同时依托东道国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以及跨国和族群网络。这种双重嵌入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动态平衡机制,使移民商业既能利用东道社会的机会,又能通过族群网络获得补偿性资源,从而增强在地生存能力。这一视角为理解跨国移民的嵌入过程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5.2　讨论

本研究为现有的“嵌入-飞地”框架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已有研究多将飞地视为移民在地化失败的副产品,而本文表明,飞地也可能是移民群体为应对环境不确定性与社会排斥所采取的主动适应性策略,是具有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展现出移民在在地化过程中的灵活性。同时,本文提出“双重嵌入”的分析视角,强调小型商业既要在东道国社会制度与市场中扎根,又要在跨国与族群网络中寻求支持。双重嵌入并非静态状态,而是一种动态平衡,它揭示了移民经济活动如何在全球与地方之间不断调适,这一视角有助于深化对跨国移民经济实践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的案例分析显示,中国移民在亚的斯亚贝巴形成的双重嵌入与飞地化策略,并非孤立于当地情境,而是折射出全球南方城市普遍面临的移民治理挑战。无论是在非洲其他国家,还是在拉美与东南亚的类似场景中,移民小型商业如何在嵌入与飞地之间寻找平衡,都是值得持续关注的议题。因此,本文的案例虽具有特殊性,但也在普适层面揭示了全球南方移民经济实践的共性逻辑。

在实践层面,研究结果为中非合作中的移民治理提供了启示。研究案例表明,虽然中国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本国与东道国社会的双重嵌入,但由于就业市场竞争、文化隔阂以及地方治理制度的不足,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因此,中方可在海外移民服务中完善法律援助、语言培训和跨文化交流机制,并与埃方在劳动力市场与城市治理中加强合作,从而设计更加包容的政策框架。中埃双方的制度创新与合作实践可以推动移民商业从被动的生存策略转向更具合作性的共生关系。这不仅有助于缓解移民与本地社会的矛盾,也体现了通过移民治理推动合作共赢,并积极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KAYIZZI-MUGERWA S. Jostling for space in Africa's business periphery: A review of the growing competition between indigenous and Chinese-owned enterprises. Southern African Journal of Policy and Development, 2022, 6 (1): 5.

[2] 高哲. 安哥拉中国新移民雁阵迁移研究.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22. [GAO Z. A study on the flock migration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Angola. Fuzhou: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2.]

[3] 郭忠华,NASSER B. 国际援助中的互惠主义与现实主义——基于中、法两国对非洲援助的比较. 中国政治学,2021 (3):119-132. [GUO Z, BOUCHIBA N. Reciprocity and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ai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s and France's aid to Africa.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21(3): 119-132.]

[4] LIU S. China town in Lagos: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Nigerian State since the 1990s.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19, 54(6): 783-799.

[5] 杨晓婷,黄玉玲,安宁,等. 跨国移民企业的形象建构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对津巴布韦中国移民企业的观察. 世界地理研究,2022,31(6):1179-1191. [YANG X,HUANG Y,AN N,et al. A study on the image construction and its impact mechanism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 enterprises: Observations from Chinese immigrant enterprises in Zimbabwe. 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2,31(6):1179-1191.]

[6] 周微,温国砫. 中国新移民赴非经商创业行为机制研究.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3,15(06):98-111. [ZHOU W, WEN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G. A study on the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mechanisms of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 Journal of Primitive Ethnic Culture, 2023, 15(06): 98-111.]

[7] 高哲,朱宇. 安哥拉中国新移民的迁移历程及回流原因研究.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4(05):78-85. [GAO Z, ZHU Y. The migration process and return reasons of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Angola. Journal of F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 34(05): 78-85.]

[8] 杨蓓蓓. 非洲中国新移民的健康挑战和求医策略研究——以赞比亚为例.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10):36-44. [YANG B. Health challenges and medical-seeking strategies of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 A case study of Zambia.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40(10): 36-44.]

[9] FEI D.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precarity in the shadow of pandemics: 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24: 1-22.

[10] DUNNING J.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1988, 3(1): 21-66.

[11] MEYER K, MUDAMBI R, NARULA 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local context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multiple embeddednes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2): 235-252.

[12] MASSEY D. For Space.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5.

[13] YAN H, SAUTMAN B, LU Y. Chinese and 'self-segregation'in Africa. Asian Ethinicity, 2018: 40-66.

[14] HWARN A. Harnessing the dragon: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Mexico and Cuba. The China Quarterly, 2012, 209: 111-133.

[15] TEDESCHI M, VOROBEVA E, JAUHIAINEN J. Transnationalism: Current debates and new perspectives. GeoJournal, 2022, 87(2): 603-619.

[16] FAIST T. The mobility turn: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13, 36(11): 1637-1646.

[17]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Readings in economic sociology, 2002: 38-62.

[18] ZUCKIN S, DIMAGGIO P.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1990.

[19] ASHOURIZADEH S, LI J, WICHSTROM K. ImmigrantsEntrepreneurial networks and export: A comparative study.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20: 1-28.

[20] SCHOTT T. Entrepreneurial pursuits in the Caribbean diaspora: Networks and their mixed effects.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8, 30(9-10): 1069-1090.

[21] KLOOSTERMAN R, VAN D, RATH J. Mixed embeddedness,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and informal economic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9, 23(2): 253-267.

[22] KLOOSTERMAN R, RATH J. Mixed embeddedness revisited: A conclusion to the symposium. Sociologica, 2018, 12(2): 103-114.

[23] 周雯婷,丁哲璇,马凌,等. 跨国族裔经济空间的在地化变迁及其机制——以苏州淮海街为例. 人文地理,2025,40(02):31-41. [ZHOU W, DING Z, MA L, et al. Localization changes and mechanisms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economic space: A case study of Huaihai Street in Suzhou. Human Geography, 2025, 40(02): 31-41.]

[24] LAMPERT D, TAN-MULLINS D, CHANG D, et al. Chinese migrants and Africa's development: New imperialists or agents of change?.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4.

[25] LI Z, MA L, XUE D. An African enclave in China: The making of a new transnational urban spac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9, 50(6): 699-719.

[26] FEI D. Chinese in Africa: Expatriation regime and lived experienc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23, 49(11): 2720-2741.

[27] SCHÜLLER S. Ethnic enclaves and immigrant economic integration. IZA World of Labor, 2022.

[28] PORTES A, MANNING R. The immigrant enclave: Theory and empirical examples//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2019: 568-579.

[29] XIAO, ALLEN H, LIU S. The Chinese' in Nigeria: Discursive Ethnicities and (Dis) embedded Experienc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21, 50(3): 368-394.

[30] 宋宗员,刘云刚,安宁,等. 跨国移民的地方感研究:以在穗非洲移民为例. 人文地理,2022,37(04):65-74. [SONG Z, LIU Y, AN N, et al. A study on the sense of place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s: A case study of African migrants in Guangzhou. Human Geography, 2022, 37(04): 65-74.]

[31] 金鑫,林俊帆,黄旭. 跨国移民飞地的"传统模式"与"广州模式"比较——基于全球、地方和个人尺度的分析框架的探讨. 热带地理,2024,44(12):2292-2302. [JIN X, LIN J,HUANG X. Comparing "Western Classic Mode" and "Guangzhou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Mode"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 urban enclaves: Three logics at global, local, and individual scales. Tropical Geography,2024,44 (12): 2292-2302.]

[32] 刘云刚,周雯婷,黄徐璐,等.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广州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案例研究. 地理科学,2017,37(7):976-986. [LIU Y, ZHOU W, HUANG X, et al. Production of space of South Korean enclave in Yuanjing Road, Guangzhou. Scientia Geographical Sinica,2017,37(7): 976-986.]

[33] MOHAN G, TAN-MULLINS M. 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 as new agents of developmen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9, 21(4): 588-605.

[34] OLAKPE O, TRIANDAFYLLIDOU A. Migrations between Africa and China: A decentered approach. African Human Mobility Review, 2023, 9(2): 5-15.

[35] PARK Y. Chinese migration in Africa .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36] COOK S, LU J, TUGENDHAT H, et al. 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 Facts and fictions from the agri-food sector in Ethiopia and Ghana. World Development, 2016, 81: 61-70.

[37] PARK Y. Forever foreign? Is there a future for Chinese people in Africa?//Reimagining Chinese Diasporas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Routledge, 2023: 48-66.

[38] DRIESSEN M. Tales of hope, tastes of bitterness: Chinese road builders in Ethiopia.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Embeddedness and enclave: Small business practices of Chinese migrants in Addis Ababa

GAO Han, WANG Xingpi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mpetu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Going Out" strategy,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migrants have relocated to Africa to engage in small-scale commercial activities, sparking scholarly debates on how migrants integrate into the host country's economy and society. Taking the case of Chinese small business activities in Addis Ababa as a representative example, this study employ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to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igrant business network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hinese migrants pursue a strategy of "dual embeddedness", construc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networks across both the home and host countries in order to sustain their livelihoods and pursue development. In response to exclusion from host societies and their own sense of insecurity, Chinese migrants have established "enclaves" as self-segreg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spaces. The formation of such enclaves is not merely a passive reaction to marginalization, but also an active strategy undertaken by Chinese migrants to safeguard their interests and maintain their social network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small-scale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offers insights into facilitating the overseas operations and everyday lives of Chinese migrants.

Key words: Addis Ababa; Chinese migrants; small business; dual embeddedness; enclave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